

● 中国哲学

启蒙的自主性与明清思想的定性

储 昭 华

(华中师范大学政法学院, 湖北武汉 430079)

[作者简介] 储昭华(1963-), 男, 安徽潜山人, 华中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副教授,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中国哲学专业博士生, 主要从事中国哲学研究。

[摘 要] 真正的启蒙必须具有自身内在的动力, 且必然带有各自不同的民族文化特征。以康德启蒙思想核心内涵及其影响的差异的对比分析, 可以揭示出中国明清进步思潮不仅具有真正的启蒙性质, 而且由于其源自自身而具有更根本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关键词] 启蒙; 自身; 理性

[中图分类号] B248.9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881X(2005)04-0412-03

“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性, 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1](第22页)这是德国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康德关于启蒙运动的一个经典定义。与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的高扬“理性评判一切”的口号相比, 康德的定义中不仅“理性”有着所有格, 而且在以反身代词“你自己”出现的所有格下面打上了着重号。这个微小的差别, 隐含着对启蒙精神的不同的诠释, 进而深刻地影响着人们对一系列其它问题的认识。认真领悟和分析这种差异性, 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理解启蒙精神的实质, 而且可以为我们认识中国文化中明清思想的性质及其意义问题是有深刻的重大启示。

在《答复这个问题: “什么是启蒙运动?”》著名文献中, 康德的讨论始终都是围绕着“你自己”这个中心展开的。所谓启蒙的对象, 就是“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1](第22页); 与之相对应的, 启蒙的主题就是让人们自己自由、公开地运用自己的理性去认识发现世界, 独立地判断和确立价值, 最终实现自己。透过这种对“你自己”的强调, 康德所要凸现的乃是启蒙所应有的自主性和差异性。

康德这一定义的意义首先在于, 从更深的层面上为人们揭示出启蒙精神的核心内涵: 真正的启蒙运动必须是出自人们自身, 标志着人自身理性的成熟和人自身的觉醒。所谓“你自己”既是指整个人类, 也是指每一个个体, 而从思想文化层面上说, 更多的是指一个民族自身。对一个民族来说, 所谓启蒙意味着通过对自身文化传统的批判, 逐步摆脱旧的传统观念、制度和习俗的束缚, 确立起新的价值, 使自身精神得到彻底的更新和升华。这一过程既不可能超越, 更不可能由他人所代替。只能通过自身的创造性转化, 才能完成这一使命。外在的力量固然具有激发、引导作用, 但真正的动力只能源自主体自身的觉醒, 这种觉醒才会真正发挥作用。外在的技术乃至具体的制度设计, 可以借鉴先进民族的经验, 采纳已有的成果, 但内在的民族精神的改造和更新只能由自身来承担和完成。为此康德告诫人们, 单纯通过一场外在的革命或许可以实现推翻个人专制, 但“绝不能实现思想方式的真正改革, 而新的偏见也正如旧的一样, 将会成为驾驭缺少思想的广大人群的圈套”^[1](第24页)。无视这一点, 如果不发掘、激活自身的内源动力, 幻想照搬别人现成的模式, 直接移植别人启蒙的成果, 以此来超越、取代自身应完成的使命, 其结果只能是貌合神离, 最终将付出惨痛的代价。这已为其后很多民族的历史教训所证明。

康德这种对启蒙的主体自身创造性的强调, 必然蕴涵着启蒙运动所奠基的现代性具有多样性、多元

性的趋向。自由地运用自己理性展开启蒙运动的主体,总是处于具体的时空之中,体现为置身于各种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之中的民族主体。特定民族的主体在奋起批判传统的背后,不可避免地与传统有着割不断的内在联系,都会打上民族的烙印。因而启蒙精神在不同的历史时空中必然以不同的形态体现出来,具有不同民族文化的特征,从而就决定了启蒙精神具有多样性或多元性。

在近代西方启蒙运动那里,不同时期不同民族的启蒙运动便具有各自鲜明的特色,甚至不乏相互诋牾或矛盾之处:与彻底的革命性和对理想远景的强烈渲染而著称的法国启蒙运动不同,英国的启蒙思潮则显得温和,带有其特有的经验论色彩,而其后的德国启蒙运动则更着力于弘扬其民族精神,对整体性和内在精神因素更为关切;同样,也可以更好地解释为什么同为启蒙理想的组成要素或具体体现形态,彼此之间并不遵循同一种逻辑,非但不完全一致,也往往相互冲突,因为不同阶层所诉求的目标必然相互差异,作为思想代表的思想家由于其立场、出发点不同,所借鉴利用的资源不同,便会提出不同的主张,从而呈现出多样性、复杂性乃至矛盾性。正是这些色彩斑斓的差异性、多样性构成了波澜壮阔的近代西方启蒙运动的整体图景。也正是通过这种差异性而形成的相互补充和矫正机制,才使得近代西方启蒙运动健全地发展和最终结出硕果,这才是近代西方启蒙运动的魅力和启蒙精神的精髓所在。

当然,我们还可以进一步从启蒙的自身性中领悟出启蒙精神的开放性。无论是在个人的生存过程之中,还是在人类的历史过程之中,始终都离不开理性的自主运用。这就决定了启蒙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一个一劳永逸的结果,而是永无止境的开放的过程。启蒙永远是未完成的。正是这种未完成性,为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提供了永不衰竭的动力源泉,并为人类的健全发展提供应有的指导和保证。

而与康德的定义不同,在所谓“理性评判一切”这一口号中,无所有格的理性则是以超时空的、绝对普遍的主体出场的,成为君临于一切之上、衡量评判一切的普遍法则和尺度。然而,不是由多元形态相互对话或交融而来、不是建立在多样性基础之上的普遍理性,不可能是真正的普遍性,其本身就缺乏足以成为普遍的合法性。这种脱离多样性的普遍理性,在现实的历史中总是以特定的主体、特定的形态体现出来,当它以普遍的身份衡量一切时,实质上只是以一种以普遍性面目出现的特殊性来判定一切,或更确切地说,乃是以普遍的名义而导致的单面或单极化,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社群主义者关于西方现代性的抨击,决非毫无理据。任何普遍性都不是先行、现成地存在于某处,更不可能由某个特殊的族群或个人来钦定或颁布,而只能通过不同民族的实践、比较、对话和交融而生成、显现出来,也就是说,只能从多样性中寻求、生成普遍性。现代性之所以招致所谓“话语霸权主义”或“欧洲中心主义”等等的指责,不能不说与对启蒙精神的这一绝对主义的诠释有着渊源关系。

康德关于启蒙精神的上述思想对于我们更深入地认识中国明清思潮的性质与意义问题提供了一种比较准确的坐标。诚然,不容否认,按照西方启蒙运动所展示的远景理想来衡量明清思潮有许多的不足。我们知道,明清思潮的提出者,其人格依然没有从传统文化体系中彻底独立出来;在他们思想的最深处,还潜藏着传统文化的某些价值取向;在他们思想的终结点上还不同程度地具有保守的色彩,……然而这一切不仅不应该导致对其方向和内在精神的否认,恰恰相反,更应该促使我们珍视这一思想源流,认识到其对于中国文化发展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它本质上乃是在自身内在动力的推动下(当然也同样有外来思想的激励和引导)、中国文化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对自身的反省,标志着中华民族自身理性觉醒的开始,是在寂静长夜中所显露的现代价值观初生的曙光。如果说,明清之交和清代初期,顾炎武、黄宗羲等人的启蒙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尚带有“夷夏之辨”的色彩的话,则随着认识的深化,在戴震等人那里,则越来越深入地转向对传统历史与文化的批判上,并力图通过这种批判确立起新的价值趋向。这才是它的真正意义所在,也才是启蒙运动的应有之义。更重要的是,其反省的结果正是西方启蒙运动所呼唤的,与后者有着内在精神的共鸣和相通性。从这一角度来说,这也反过来证明了启蒙运动的出现不是某一种文化形态的偶然事件,不是某个民族的偶然发现,而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人类精神成熟、进步的必然结果。当然,这也并不意味必须掩盖其固有的缺陷,放弃对它的批判,但这种揭露和批判的意义,更应该理解为一种向新的、更高的目标跃进的导引,是为了更深入的启蒙而批判。正如哈贝马

斯所说的,启蒙只有通过更彻底的启蒙来弥补自身的不足,而不应该相反,因彻底否定而将原本稚嫩的启蒙的幼苗窒息于自己的手中。

从这一视阈来重新认识近代以来一代代有识之士对明清启蒙思想资源的发掘工作,就不难理解其深远意义和良苦用心了。从梁启超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思想史》,到侯外庐的《近代中国思想学说史》,再到当今问世的萧蓬父、许苏民的《明清启蒙学术流变》与吴根友的《中国近代价值的初生历程——从李贽到戴震》等一系列著作,不仅以极其丰富的史料揭示了这场思潮与西方启蒙思潮之间的“家族相似性”,更以此警示人们,一方面,我们应该而且也能够通过发掘自身的启蒙思想资源,来完成我们自身的启蒙使命;另一方面,启蒙理想要在华夏大地上真正开花结果,也必须实现与本土文化的融合。正如吴根友教授在其著作中所言,如果人们普遍地认为,中国没有自己的现代性文化资源,我们只能按照西方的模式现代化,则我们的现代化资源全部依赖进口,这将是自绝生路的做法^[1](第45页)。

那种仅仅因为明清思潮未达到近代西方启蒙运动所达到的高度,不完全合乎既有的模式,便否定其启蒙性质的观点,正是上述在普遍性的形式下将启蒙精神单极化理解模式的体现。这种基于对某种模式的迷信,将启蒙运动模式化、单面化,进而将其作为评判一切的惟一标准的认识方式,恰恰是对启蒙精神的背离。沿着这一理路推论下去,其结果势必面临着两种结论:要么彻底否定中国文化本身,全盘照搬西方现代性,认为这种文化本身不可能实现与现代性的对话与融合;要么就彻底断绝中国文化走向现代性的可能性,因为二者始终是相互对立的。对于前者,如果说康德的回答只是一种理论分析的话,现实的历史早已给出了更有力的回答。至于后者,相信这种观点的提出者本人也不愿意看到。

[参 考 文 献]

- [1] [德]康德. 历史理性批判文集[M]. 何兆武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
[2] 吴根友. 中国现代价值观的初生历程[M].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

(责任编辑 严 真)

Significance of Enlightenment of Origin from Oneself & Nature of Ming-Qing Enlightened Thoughts

CHU Zhao-hua

(School of Politics & Law,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Hubei, China)

Biography: CHU Zhao-hua(1963-), male, Associate professor, School of politics & law,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Doctor Candidate, School of Philosophy, Wuhan University, majoring in Chinese Philosophy.

Abstract: Any true enlightenment must have it's own internal impetus and posses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ir own national traditional culture. Starting from the interpreting the nuclear connotation of Kant's enlightenment thoughts, the thesis expounds the argument by comparing and analysing the difference in the basic point, direction and influence between it and 18 century France enlightenment thought. According to the argument, the article suggests that the Ming-Qing thought not only is part of the Enlightenment, but also has profound significance because of originating from our traditional culture itself.

Key words: enlightenment; self; rationality